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

历史的旁白

——中国当代语言学家口述实录

Historical Narrations:

Interviews with Chinese Contemporary Linguists

○ 张 宜 著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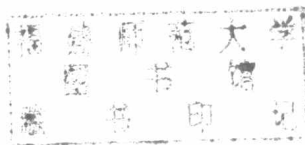
历史的旁白

——中国当代语言学家口述实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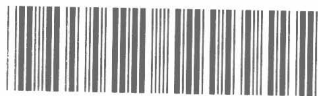
Lishi de Pangbai:

Zhongguo Dangdai Yuyan Xuejia Koushu Shilu

○ 张 宜 著



1034584



T1034584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HIGHER EDUCATION PRESS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的旁白：中国当代语言学家口述实录/张
宜著. —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8

ISBN 978-7-04-035790-5

I. ①历… II. ①张… III. ①汉语史-现代 IV.
①H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49055 号

策划编辑 王 丽
责任校对 杨凤玲

责任编辑 王 丽
责任印制 朱学忠

封面设计 张 志

版式设计 杜微言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35.25
字 数 800 千字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http://www.landaco.com.cn>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9.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 料 号 35790-00

口述历史为什么值得做

——《中国当代语言学家口述实录》序

“口述历史”(oral history)已不是新名词。近年来,各个领域都有人从事口述历史研究,但在语言学界这项工作起步较晚。2002年,张宜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从我研修语言学史。当时我见欧美已有语言学家做口述历史,便提议不妨考虑同类题目。她的博士论文最终定题为《中国当代语言学家口述档案研究》,完成于2005年。读者现在看到的这本《中国当代语言学家口述实录》,既是她为做论文而系统集取的资料(包括后来的少量补充),也是她从事中国语言学口述历史研究的一项实践。

在我国语言学界,过去也有学者偶尔留下口述作品,如接受采访的答问,由他人笔录的回忆等。可惜这些都散碎零落,鲜有章法,采录的过程也很随意,形成的文本因而称不上“口述档案”。中国语言学口述历史的系统规划是从张宜开始的。她参考国外口述史学的惯例,使受访对象达到一定的规模,能涵盖语言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并且设计了严格的操作程序:访谈有设定的话题,围绕这些话题逐步展开;先行录音,再转为文字,文字稿复由受访者审读;与受访者签立协约,规定双方的义务和权限。这样获取的文本,便成为拥有声音和文字两种形式的口述档案。

这项工作的难度和艰辛是可以想见的。出于种种原因,被认为属于理想人选的学者并非都愿意接受采访;即便愿意受访,也并非人人都同意授权发表。有些学者容易合作,乐意就采访者的提问展开叙述;有些学者不愿受话题牵制,喜欢自由漫谈。有的学者欣赏天然,会尽量使录音与文字保持一致;有的学者追求完美,不容文字稿上出现松散随便的表达。口述历史按理说应该是最轻松的历史,然而实际操作的过程却绝不轻松。这些年来的联系之烦、奔波之劳、转写之难,以及遭人误解甚至毁谤之苦,张宜极少同我说起。她是一个能忍的人。所谓十年打磨一剑,张宜积近十年而编成此书,可算得是工夫不负耐心人。

口述历史是新鲜事物,不免遭人指议。有人会质疑口述历史的合理性,以为它不可靠,不是科学的历史研究法。人们久已习惯从常规史书上读取历史,对于忽然冒出的这门口述历史,自然会感觉怪异,由此而心生疑虑,也在情理之中。在此,我想举出几条理由来为口述历史辩说,谈谈为什么这门史学分支可以成立,为什么它值得我们做。

口述历史很年轻,是一个新领域,这是有些人嫌弃它的一个原因。年纪轻,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不牢靠,况且年轻人行事有时也的确毛糙。但口述历史真的很年轻么?其实,最早的历史全靠口述得来,否认口述材料的价值,无异于消灭历史的开端。18 世纪的英国文学家塞缪尔·约翰逊说过,任何历史最初都是以口述的形式存在。中国的史学传统可谓悠久,然而也不例外,一样发端于口述。《汉书·艺文志》上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记言就是记人所述,记下来的便是口述史料。海外有史家打趣说,把 history (历史) 这个词拆开来,意思就是“他的故事”(his + story),所以历史就是某人讲的故事。今人欲了解早期传教士来华、中西文化交触的情状,乃至明末中国社会的变迁,不能不读《利玛窦中国札记》。这本书是什么呢?无非是利玛窦讲述自己的经历,由他的门生金尼阁笔录成书。所以,如今我们从事口述历史研究,某种程度上即是回归历史学的原生态,重拾初始、自然的叙史法。

现代意义的口述历史确实很年轻,口述与访谈相结合,在欧美是 20 世纪 40 年代才有的事情。口述历史从那时起逐渐成熟,建立起自己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发展成为历史学的一个门类。1948、1954、1958 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洛杉矶分校先后创建口述历史档案馆;1967 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诞生;1987 年,国际口述历史协会宣告成立。口述历史无意取代、也不可能取代常规历史,前者只是对后者的一种补充。

张宜编辑这本《口述实录》,不是要撰写一部“20 世纪中国语言学史”,而是要以访谈所得充实 20 世纪中国语言学的记录。将来人们会发现,本书为认识这一时段的中国语言学增添了一份独特的旁白。口述材料对于常规历史的补益颇多,例如口述材料会涉及学术史上的重大事件,更有可能披露那些推动或阻碍学科进展的人事因素、机构环境、建制安排等等。这些都是隐匿于学术背后的东西,常规的学术史论著通常不予载录。学问以外的这类因素小觑不得。一种学术能否兴盛,有时并不由其自身的内容、价值、意义等决定,而是取决于外部条件。

常规历史依赖于书面文献,口述历史取材于活生生的人。文献人人可用,倘若撰史者缺乏好眼力,又没有好手笔,写出的历史不但没有新意,连可读性也难保。所以,常规历史倾向于划一,经常很没趣。据说《中国革命史》多达百种,其中大半雷同;以“中国语言学史”为题的著作也不少,其中有些颇相像。口述历史则不一样,雷同的可能性极小。因为学界众生相,其个性绝不重复。于是口述材料篇篇鲜活有趣。一个人的学术创为与他的个性很有关系。常规的学术史主要记叙著作、观点、理论、方法等,很少会让我们看到学人的个性。只有在口述访谈中,学人的个性才能得以呈露。一个学者乐意接受采访,

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他比较大方，愿意让学界分享自己的回忆、想法、私见。

有人说，口述历史不可信，因为叙述者会说假话。这种看法很奇怪。说不说假话跟口述与否没有关系。人若有说谎的倾向，在付诸笔墨（如写回忆录）时就有更多的时间思忖怎样把谎话说圆。不过，在口述访谈中，因口误或记忆偏差，或凭直觉应答，没有时间多作思考，的确更有可能说错话，或者说了事后觉得不妥的话。但这也只能说是口述历史的特点，不是缺点。待录音转为纸本，请受访者过目时，他有机会订正，直至删除某些段落。只是对原始录音不可能作改动，所以每一份口述就有声音和文字两种形式的文本。对比两种文本，也许另有研究的价值。但这涉及受访者的隐私，采访者须尊重对方的意愿，以书面协议的形式约定是否可以公布录音。口述历史有法律层面的考量，口述访谈因此很不同于新闻访谈。当你接受记者的采访时，你的话通常只有一部分会被采录，而发表哪些内容一般由不得你；记者可以全权处理你的话，除非你事先声明某些话“不得发表”；至于被添油加醋，被说了你从未说过的话，也属常见。总之，面对新闻采访你没有话语权。当然，如果你权够大、位够高，则当别论。

而像新闻采访这样的做法在口述历史中是不容出现的。口述史家唐纳德·里奇呼吁“把话筒交给人民”，“让人民来说话”（《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受访者是话筒的主人，始终握有话语权，采访者则起引导话语的作用，通过与受访者的互动来贯彻访谈的框架。在这一意义上，口述历史是历史研究走向民主化的标志。此外，由众多学者分别讲述经历，是学术史研究趋向多元化的表现，一门学科的进程从此具有丰富多姿、个性纷呈的面貌。本书收录的虽是“名家”的访谈，“名家”在此和在其他场合一样，并无严格的准入条件。中国语言学的口述历史尚在草创阶段，数十位受访者甘为示范，已是对这项事业的莫大支持。至于我个人加入受访者的行列，还因为需要配合张宜，当她的实验对象。这一切的第一步迈出于十年前，十年后终于小有所成。惟祈读者喜欢本书，并且赞同我们的看法：口述历史值得做。

姚小平

2010年7月于北京外国语大学

前言

1. 引言

现代意义的口述史学诞生于 20 世纪中叶的历史学领域，它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正像许多其他历史学科一样，口述史学也具有悠久的文化和历史传统；同时，该学科采用了现代科学技术，使得口述史学工作者成为史学界里唯一专门和当代人打交道的人，因而，“他们是搜集历史声音的人”（唐诺·里齐，1997：23）。可以说，口述历史的方法拓宽了史学研究的领域和范围。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中国口述史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并逐渐与国际口述史研究接轨，“口述史学”这一术语也开始被学界正式接受。当前，口述史学是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也是一种新的实证研究方法。在西方语言学界，20 世纪 70 年代已有人从事口述史的研究，即根据一定的框架，分期分批对一些语言学界的名家进行访谈，并将访谈录音和记录所得编辑成书，如 Boyd H. David 等 1980 年编的 *First Person Singular*（《个人自述》）。在我国，口述研究已见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领域，但在语言学上，这方面还是空白。

研究、撰述当代中国语言学史是件很难的事。其一，从事这项工作的研究者应该对语言学，特别是中国当代语言学的所有领域都同样地熟悉。其二，各个阶段的原始资料的范围、性质和保存的状况都不相同。在这种前提下，让那些对中国语言学及语言学发展等感兴趣的人“知道我们语言科学走过的道路和目前的状况，是十分必要的。……要知道这一切，都离不开了解作过研究的人。因此，以人作为线索，来看一看过去和当代的一些语言学工作者走过一些什么道路，他们是怎样工作的，他们作过一些什么努力，取得一些什么成绩，很有必要。目的主要不在于了解这一个一个的人，而在于了解我们语言科学的经历”。（张志公，1989）

2. 语言学史学研究

2.1 西方语言学史学研究

语言学像其他任何一门科学一样,都是自身历史的产物。20世纪50年代以来,语言学史研究逐渐从普通语言学中分出,发展至今,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分支——语言学史学(historiography of linguistics)。语言学史学既指语言研究的过去史,也关注语言学历史文献中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简言之,语言学史学就是研究语言学史的方法(an approach to history of linguistics),即撰写语言研究历史的原则方法(principled manner of writing the history of the study of language)。它不仅考察语言学的历史,而且要探讨与此项考察有关的理论、方法、框架和概念。(Koerner, 1989; 1995)

到了20世纪末,西方语言学史的研究更为重视历史传统的发掘和整理。表现在:(1)把当代史的及时整理和记录提上了日程;(2)努力为语言学的各领域提供全面的文献资料和背景知识;(3)对某个时期的语言学史、某一专题的探索过程、某一个人的学说体系的研究更加细密;(4)把语言学史看作思想史的组成部分,从哲学源流、文化背景、社会发展等多方面作历史的考察和分析;(5)重视语言学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姚小平, 1995b)

总体上说,西方语言学界对于语言学史的理论和方法更为重视。他们主张:(1)把语言学史纳入思想史的范围,探讨各种语言观念、流派产生的哲学根源和社会背景;(2)把语言学史视为科学发展史的组成部分,探讨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历史联系;(3)对语言学的发展史作模式化的分析;(4)提出语言学史研究者应该具备的条件。(姚小平, 1995a)

当前,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对语言学史的实证研究目前还存在着空白。随着语言学史学研究的深入,语言学史的基础研究和实证研究都应该得到加强。口述历史作为一种研治语言学史的新方法,能够提供一个观察本学科当代发展史的新视点。

2.2 中国当代语言学史研究中的问题

语言学史是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涉及理论、方法、历史以及中外语言学的关系。但是在国内外语院校或文学院的教学计划里,中国语言学史还仅仅是草创,相当的不规范;现在应当是争取建制独立,并与西方沟通的时候了。何九盈(1987下:43)在评价中国语言学史研究时曾批评道,中国语言学史研究向来是封闭式的。其主要表现有三点:第一,讲究师承、家法,墨守旧说,排斥异己,因此难有创见;第二,信息闭塞,不了解海外同行的研究情况;第三,专业分工过细,隔行如隔山,妨碍了系统的史的研究。

按照王力(1981)、何九盈(1995, 2000)的划分,中国当代语言学史(1949年到现在)才只有50余年的历史,而且对这段历史的总结才刚刚开始。采用的方式不外乎有两种:理论概括和历史评价。学术史的研究就属于后一种性质的总结。在论述这种总结的必要

性时,何九盈(2002:1)曾经说过:“学术史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认识史,是一部通过学术实践不断地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我们就要自觉地对前人的学术实践及其认识路线,乃至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加以总结。其实,凡是有突出成就、做出了重大贡献的语言学家,他们都对自己所研究的领域的历史状况进行过清算,并在清算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的实践路线、方向、方法。这种‘清算’就是一种认识活动。”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西方语言学史已成为语言科学属下的一门独立的分支。语言学史学的学科建设所必需的基础工作已全面展开。而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在方法、目的和框架等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尤其是断代、专题、个案的研究,更须加强。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微观考察和史料发掘,没有新的观点和方法,那就很难再有提高(姚小平,1995a;姚小平,2001)。

由于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历史不仅很长,而且具有连续性,所以我们要花大力气去探讨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方法。早在1987年,何九盈(1987上/下)就提出:(1)研究中国语言学史应从史实出发,不能不考虑中国传统的特点;(2)以第一手材料为据,凭史料说话,不能“人云亦云,意气用事”,“对于权威的结论,我们既要尊重,也不可盲从”;(3)加强宏观研究,探索中国语言学发展的规律;(4)运用比较研究法,展开古今、中西、断代的语言学史比较,克服因师承家法、专业过窄、缺乏交流而导致的封闭,互通往来,加强合作,以集体的力量编出高质量的中国语言学史。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当代理论语言学家的主要研究成果较少以理论专著形式出版,主要集中于各类期刊或论文集里。如果单纯从论文中提炼、归纳、总结他们的学术成果,就会有损真实。因此我们对于曾在学术上受到不公正批评、批判的学者,他们的论著以及他们的学术观点均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加以客观、公允的分析和评价;对尚有争议的观点要进行不带有偏见的整理、讨论和介绍。

3. 口述历史研究综述

3.1 口述历史的界说

所谓口述历史,指的是以录音、笔录或录像的方式,采集具有历史学价值的口传记忆和个人看法。访谈者通常经过充分的准备,有条件的可接受一定训练。口述史研究中采用的访谈法,既不同于常见的新闻采访,也不同于一般的人生忆旧、生平自叙、自传或传记。严格说来,口述访谈是受访者与访谈者在某个专业领域的范围内、就某些话题相互合作的过程,而不是受访者单方面的随意叙述,或对访谈者临时发问、随时插话的回应。访谈者事前须设计出访谈的框架,拟定若干话题,并大致决定每一话题的时间分配。同一框架、同一些话题一经确定,应保持前后一致、基本不变,运用于该研究所及的整个访谈过程,适用于所有受访者。(钟少华,1989;熊月之,2000)

3.2 口述历史的意义

在复原历史方面,口述历史有其他任何档案、文献资料无法替代的价值。因而,口

述历史近些年来在国际学术界受到广泛、高度的重视。

英国学者 J. 托什 (1987: 79) 指出:“口述历史的主要意义不在于它是什么真实的历史或作为社会团体政治意图表达手段,而在于它证明了人们的历史意识是怎样形成的……人们的历史意识就像一个战场,在这里,互相竞争的思想体系和权威的正当与否可能受到考验。”口述历史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在于,它要改变一种历史的形成。以前有很多人是作为被书写者写进历史的,史学家与这些人是一种书写与被书写的关系。而通过口述,这些人可以直接成为书写者。这就使同一段历史有了两种声音,两种文本。这是对过去的历史和文献制造出来的书写者和被书写者关系的一种挑战。并且,通过参照口述可以发现和校正文献的局限,更重要的是可以指出文献中最深刻的缺陷。

口述资料可以作为文献资料的补充。当代西方的口述史学家都强调指出,口述资料和文献资料在历史研究中各有利弊。文献资料的优点是排除了心理因素,从时间上看,事件发生当时的文件和书信比后来记载下来的口述资料更可靠一些。但如果文献资料遭到有意无意的曲解,那么任何人都将毫无办法,因为一些文献的当事人已经不在人世,而口述资料的当事人却是活着的,历史学家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立场对口述资料作必要的修正。因此,在一定条件下,口述资料反而比文献资料更加真实。(J. 托什, 1987; D. 里奇, 1997; B. 斯代夫, 1999; B. 汤普逊, 2000)

口述历史给史学研究带来重大的变革。以往大部分历史资料均查之于图书馆、档案馆,所谓“无一字无来历”,实际上是无一字不是来自文献。文献资料不能再生,口述历史则有源可寻。一个是“读”历史,一个是“听”历史。读者与文献的关系,只能是读与被读的单向关系,文献不会说话,怎样理解是读者自己的事。口述资料不同,不仅受访者有声音,访谈者也有声音,二者可以反复对话。而且访谈者还可以就同一主题与不同的受访者对话,反复验证结论,不断地去伪存真,使得研究结论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口述历史的开展,为历史研究,特别是当代史的研究,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天地。总之,“口述历史使英雄不仅来自于赫赫有名的领袖,也可以来自默默无闻的平民;它把历史引入群体,也把群体引入历史。同时,口述史也向某些历史的假设和公断发出挑战,对曾被忽视的实质性群体重新认识。……这是口述史的意义所在,也是口述史研究在世界各地方兴未艾的原因”。(B. 汤普逊, 1988)

3.3 口述历史的特点

口述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访谈者与受访者的双向进程。受访者有丰富的经历,有许多值得挖掘的资料,但他不一定是历史学家。其在讲述的时候,很可能受记忆、情绪、选择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讲了许多,也遗漏了一些;甚至讲了枝节的,而漏遗了关键的,讲了感兴趣的,而回避了不堪回首的;讲对了一些,也讲错了一些。张冠李戴,前后倒置,以及片面、主观、情绪化等问题的存在也是完全可能的。在此情况下,访谈者可以凭借自己的学术素养,通过提问、讨论、串联、整理,使访谈按照既定的路径前进,使访谈资料得到补充和完善,使访谈质量得以提高。

从历史记录的广度而言，口述历史提供了相当广阔的空间。以往的档案、文献，比较偏重于记录权力阶层的活动，偏重于社会精英的活动，偏重于政治方面的活动，而对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等则记录较少，即使有，亦多为枯燥的统计数据，缺少真实生动的个案记录。口述历史在这方面可以弥补传统档案、文献的不足。口述历史可以驰骋的空间很大，它可以给那些在传统史学中没有机会留下声音的平民百姓留下记录，可以为那些在传统史学中没有位置的事件开拓出存放的空间（钟少华，1989，1998；熊月之，2000）。

4. 口述历史在中国语言学史研究中的新视点

口述历史是对人的研究。历史是人所创造的，研究历史在这一意义上也即研究人。通过口述历史的研究，不但可以获得关于历史事件的各种信息，而且可以深入了解历史创造者本身。就学科史而言，口述历史研究尤其可以告诉我们：作为各个领域的带头人，学者个人在当代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以及怎样看待他人、评价自我，等等。总结中国当代语言学的发展很重要，但是研究这一代学者的学术成果和理论成果，研究形成这些理论的人文因素也很重要。“……由于语言学家也是社会的成员，也是社会文化传统和环境的一部分，所以他们的思想会在很大程度上超出具体的语言范畴。我们与其问他们写过什么或者传授过什么，还不如从本质上关注他们为什么和怎么样逐渐有这样的思想和学说。如此这般，我们才可能在科学史、甚至人类总的思想史中面对语言学史。”（Robins，2001：3）口述历史正是一种研治语言学史的新方法，它能够提供一个观察本学科当代发展史的新视点。

4.1 语言学史口述研究的意义

第一，口述历史是对基于文献的传统历史学的补充。长期以来，史学家们及其修史工作往往受制于书面文献，提倡字字有来历，使得历史研究带有相当的局限性。口述历史研究可补文献史料之不足，印证文献资料的可靠性，并且是以一种生动的口耳方式来叙述和传承历史，使鲜活的语言学史料得以保存。通过书面文献与口述史料的结合，研究人员和后人不仅能够读到、看到，而且能够“听到”语言学的历史。在中国语言学史上，这将是首次以声音的形式记载和保存本学科的史料。

第二，口述历史是一种新的历史文本，它改变了书写者与被书写者的关系。在一般历史研究中，造就历史者被史家写进历史；而通过口述历史方式，造就历史者直接书写历史。这就使得同一段历史有了两种声音，两种文本。

第三，从事口述史研究的目的之一，在于“抢救”历史。学者口述的回忆、见解、评论等等，都是极珍贵的史料，往往不同于一般史书所载。以往研究学科史，不甚重视口述方式，以至许多史料随人而逝，非常可惜。如今不少语言学家因年事已高或其他缘故，不暇著述，他们口传的历史尤其需要记录和保存。此外，前辈学者的治学经验、研究心得，也是不可多得的财富，可以通过口述方式嘉惠

后学。

第四,口述历史首先是一种个案研究。在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中,以口述历史最为突出个案探考的价值。口述历史注重历史叙述的个性化,让历史从不同人的口中直接道出[按照美国语言学家 Charles F. Hockett 在其自述中的说法,语言学史可分为两类:一类属于“知识史”(intellectual history),另一类属于“个性史”(personality history)]^①。而通过一系列个案考察,对口述史料加以归纳、分析、判断,则可以取得多重角度的历史观。从某种角度来说,个性化的语言学史对成就语言学的知识历史更有价值,不可或缺。把对语言学个性化历史的研究纳入中国现当代语言学的领域将具有深远的意义。

对于今后中国语言学研究的重点,一些人士认为:第一,侧重宏观语言学,语言与心理、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文化等之间的关系,鼓励跨学科的研究;第二,着眼于认知语言学,语言与大脑和神经的关系;第三,鼓励用科学主义方法和高科技手段进行研究(许嘉璐、王福祥、刘润清,1996:304)。把口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中国语言学,充分收集口述史料,对其进行整理、归纳、分析、判断、评价,同时将口述史料与可得到的其他文献资料结合起来使用。通过这些史料,语言学史研究人员和后来人不仅能够“看到”语言学的历史,而且能够“听到”语言学的历史。这样做可以把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借鉴到语言学领域;同时,借助科技手段进行当代语言学的实证研究也是对中国语言学发展的一个贡献。

4.2 语言学史口述研究的方法

语言学史的口述实证研究是指:经过学术和技术准备的访谈者,与当代语言学各个分支的代表人物合作,有计划、有目的地录音、记录、整理、保存并研究他们的个人自述,以便为当代以及未来的研究提供有声的备忘材料。

一、在访谈之前,访谈者应尽可能地熟悉各个代表人物的基本情况,特别是其学术上的经历和贡献;

二、访谈者要根据研究的主题设计好访谈提纲,访谈题目既要涵盖共性的问题,也要突显个性问题;

三、访谈是访谈者和受访者平等合作的过程,访谈者不能临时变更访谈提纲和访谈话题,受访者也不能随意叙述,即兴发挥;

四、经过受访者的法律授权,访谈者对所获得的录音内容加以整理、勘校,制成文稿、摘要、索引等,以供当代或未来研究之用。

4.3 语言学史口述研究的特点

从运用工具从事史学研究的角度而言,口述研究的出现,由记录文字到录音、录像,是史学领域的一个飞跃。同样,独特的口述研究方法也给语言学史的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特色。

^① 参见 Boyd H. David: *First Person Singular*,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B.V. 1980。

特点之一：语言学史的口述研究是个性化的研究。

语言学史的口述研究强调对人的研究，对个人的研究。口述研究就是储备、保存口述史料，并用其撰写出知识史（intellectual history）和个性史（personality history）的过程。

特点之二：语言学史的口述研究是学术合作的过程。

语言学史的口述研究是由受访者与接受过语言学专业训练的访谈者在专业领域的范围内，就某些重要话题相互合作的过程；而不是受访者单方面的随意叙述，或对访谈者临时发问、即兴插话的回应。访谈者事前需设计出访谈的框架，拟定若干话题，并大致决定每一话题的时间分配。同一框架、同一类话题一经确定，就应保持前后一致、基本不变，始终运用于该研究所及的所有访谈，适用于所有的受访者。

特点之三：语言学史的口述研究拓展了记录语言学史的空间。

人们对语言学史的研究即使再详细，文献资料和档案也只能记录下其中极为微小的一部分。以往的语言学史研究比较偏重于记录语言学概念和理论的形成及发展，偏重于语言学家的理论研究，而对语言学家的学术经历、思想体系的形成和确立则记录较少，即使有，亦多为枯燥的归纳总结，缺少真实生动的个案记录。开展语言学史的口述研究可以弥补传统档案、文献的不足。它可以给那些在传统语言学史中没有机会留下声音的语言学家们留下记录，可以为那些在传统语言学史中没有位置的事件开辟出存放的空间。

特点之四：语言学史的口述研究可以提供带有很强的口语成分的备忘材料。

通过有目的、有意识地对当代著名语言学家开展带有研究主题的访谈，我们可以获得对于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来说都是最基本的语言材料。它们是这些语言学家提供的思考、回忆和回顾。这些语言学家都对语言学有着同样的兴趣，他们和接受过专业教育的访谈者共同讨论语言学的发展历程、以及他们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由此而成就的材料将成为语言学史中的备忘材料，这种备忘材料带有很强的口语成分，可以用来作为一种引证，需要研究者们、甚至未来的学者们进一步的证实、评价、解释和分析。它们也会证实并引发其他一些证据。

特点之五：语言学史的口述研究可以让研究人员和后来人听到语言学的历史。

把当今仍然活跃在语言学界各个领域的代表人物、前辈和学者们个性化的研究成果通过他们口头自述的方式，有计划、有目的地录音、记录、整理并保存下来，以供当代其他学者或未来学者们研究之用，可以使日渐远逝的语言学史料得以保留。同时，将口述史料与可得到的其他文献资料结合起来使用，不但能更好地把握语言学史研究的重点，而且也是对语言学发展的贡献。

5. 结语

把口述史学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引入中国语言学史，是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必将拓宽语言学史研究的途径。通过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访谈，建立“中国当代语言学家口述史料库”。这项研究的部分成果，即当代中国语言学家口述访谈的录音资料，可以

CD-ROM 形式保存在口述史料库中。相关的录音或录像制品属于全社会。凡是对当代中国语言学史感兴趣的学者、学生，中国学术史的研究者，以及历史学的爱好者，在一定程度上都可自由使用这些资料。

对于语言学史学家而言，这些通过对语言学名家的带有研究主题的访谈而获得的口述史料只能作为一种引证，还需要研究者们、甚至未来的学者们进一步的证实、评价、解释和分析。它们不应是语言学史学术研究上的一块纪念碑，而应是一个未曾全面开垦的崭新领域。

这样做不仅仅是中国语言学史研究方面的首创，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途径，可以保留鲜活生动的语言学史料。这方面的史料和论著，将成为中国语言学史的口语备忘录，成为传承、丰富中国语言学史的有声的证明。它们均以各自的独到之处讲述语言学的历史；并为观察、探索、沟通语言学史这门学科提供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

目 录

周有光	1
吴宗济	19
张 斌	36
林 焘	48
唐作藩	62
郭锡良	74
徐通锵	85
陈章太	104
曹先擢	123
许宝华	137
胡壮麟	156
刘叔新	178
孙宏开	202
苏培成	228
戴庆厦	241
陆俭明	259
黄昌宁	278
陈光磊	298
冯志伟	325
游汝杰	362

马庆株	385
潘悟云	403
邵敬敏	436
姚小平	461
李宇明	488
顾曰国	515

参考文献..... 532

附录一 首批受访者研究	
领域分布	534
附录二 首批受访者自然	
信息	535
附录三 访谈话题	537
附录四 授权书	538
附录五 法律意见书	539
附录六 首批受访者受访	
信息	541

历史的声音..... 543

周有光

受 访 者：周有光先生

访 谈 者：张 宜

整理 / 注释：张 宜

地 点：周有光先生在北京朝阳门内南小街的寓所

时 间：2004年3月23日，上午9：00—12：00

* 本访谈整理稿经周有光先生审阅认可。该文稿曾发表在《口述历史》（第四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5月）。

张宜：周老师，您好！今天是2004年3月23日。我现在是在周有光老师的家里。我很荣幸能在这样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访谈已经将近一百岁的周有光先生。我要访谈的主题是文字改革和语文现代化。下面请周老师谈第一个问题：您是怎样走上语言学研究道路的，您为什么要从事语言学研究？

周有光先生：呵呵！我是1923年考进上海圣约翰大学。1923年到今年已经81年了。我写1923年（入学），人家都给我改成1932年——他们说我一定写错了：没有那么早的！（笑）当时的中国大学教育很不发达。圣约翰大学是所教会学校，是中国最早的一所大学，可不是中国人自己办的。到我进圣约翰大学时，它的名气大得不得了——全国第一选。那时报考圣约翰大学是最困难的。我考上了。一打听（学费）要很多钱。（可）我穷得不得了，我没有钱。我想我就不上圣约翰大学了。（当时）南京有一所大学是中国人办的，叫东南高等师范学校。实际也是一所大学，可是它不敢称大学，因为（办大学的）好多条件它不具备。可是它不要学费。我想我就进这所学校吧。后来我姐姐的一个朋友听说了（我的事），她说，那不行啊！这个圣约翰大学考进去多难啊！考上了不进太可惜了！我姐姐说（我们）没有钱啊。那个朋友说，我给你想办法去借，我的妈妈有钱，我跟她借钱（给你弟弟上学）。这样子，我就进了圣约翰大学。

圣约翰大学很怪，一进去什么都是用英语，不讲中国话。（笑）当时我们青年有一种爱国思想，有点讨厌。当然学英语是好的，不过这种气氛（让人觉得）真正是变成殖



民地了。所以我们对帝国主义有反感。不过读书条件还是很好。一进圣约翰大学，所有布告都是英文的。普通讲话、连门房都讲英文。（笑）那么立刻就发生中文和英文的比较。一比较，中文没有英文方便，文字要讲方便呐。特别是那时打字机在中国还很少，可是圣约翰大学里面的很多学生有打字机。我没有，我穷得很，连打字机也买不起，所以印象很深刻。我觉得中国的语文要改革，否则就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这样（我）就对语文的研究发生兴趣了。那时候的大学不像解放以后学苏联，专业分得很细，那时分得很粗。文科、理科、工科分三大系列。我们的工科学院不在本部，在另外一个地方。实际上在本部的是文科和理科，分得很粗。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随便你挑。它的理由是：还弄不清楚专业，你就自己定了，这是不好的。所以我一年级选课的时候选了一门语音学，这样子对语言学慢慢地有点儿了解。可是我后来读的专业是经济学，一直到解放前我在经济界，在银行工作。我在美国银行里工作。我是（19）49年解放以后回来的，上海解放时回来的。

（我）主要在中国读书，因为我穷，我想到外国读书，可是我没有钱。我在银行工作，银行就派我驻在美国工作，有好几年。那么工作之余，在外国，（每天）工作时间比较短，特别是银行比较优待，礼拜六下午可以读书，礼拜天可以读书，特别是纽约大学有许多好的课程吸引有职业的人去读。所以，实际上在美国我是工作为主，读书为辅。不过（美国）读书的条件非常好。纽约有一个公共图书馆，不是公立图书馆，公立图书馆是政府办的。它不是政府办的，它是公共图书馆，是（靠）群众捐的钱办的，到今天还是很好的图书馆。我每天就去那儿看书。这家图书馆（管理员）看我老是去看书，就问我，你研究什么？我说我研究经济学。她说你天天来看书，我们给你一个优待。（这家图书馆）有许多小房间给常去研究的人。小房间很小，比我这个房间（周老师用手指着他的小客厅）还要小，两个人用。一个人上午，另一个人下午和晚上。我是下午和晚上去。我每次都是晚上10点钟才回家。图书馆一直开到晚上12点，所以读书的条件非常好。好多青年问我现在想出国的人很多，我为什么回国？（笑）有两个原因：第一个，那时青年人觉得解放了，中国有希望了。那时国内国外的青年对共产党抱有很大的希望。后来失望是后来的事。开头几年搞得比较好。第二个原因，我妈妈在中国，她不愿意到美国去，她不懂英文。由于这两个原因，我回来了。回来后，在上海复旦大学教经济学，工作也很好。还叫我兼人民银行的工作。所以我的语言学和文字学是业余研究，不是专业的。我也没有想拿它作为专业，因为搞语言学赚不了钱。（笑）可是在1955年，在北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要我参加。为什么要我去参加呢？因为那时候（20世纪30年代）有个拉丁化运动，我参加了拉丁化运动。就是在外国，我也给国内写一些拉丁化运动的文章。

张宜：您是对拉丁化运动感兴趣，所以写文章吧？

周有光先生：对，我有兴趣。那时候中国人开始用新的方法研究中国的文法。那时候没有“语法”两个字，都叫文法。我一看人家写的研究中国文法的文章，举的例子都是文言，